

從虞犯到曝險 對曝險少年思維轉變與落實

陳淑貞、林清文

壹、前言

虞犯少年係指有觸犯刑罰法令之虞的少年，他們的行為尚未觸犯法律，因為他們的行為讓人感到擔心，而被認為應該及早介入，避免他們誤觸法網，達到預防的效果。然而，對於尚未有觸犯刑罰法令的行為的少年，將他們交由司法處理是否適當，這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以下稱少事法）在1962年制定，當時有四款虞犯少年（經常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者、經常出入少年不當進入之不正當場所者、參加妨害公共秩序之不良少年組織者、經常攜帶刀械意圖鬥毆者）與觸法少年並列於少事法的處遇對象中，二者進入同樣的審理程序及處遇過程。之後少事法歷經多次修訂，將虞犯事由增至七款（經常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者、經常出入少年不當進入場所者、經常逃學或逃家者、參加不良

組織者、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刀械者、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者、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者），從修法的演進可以看出虞犯少年的涵蓋面越來越廣。

三十年來，國內外對人權、婦女、兒少權益日漸重視。1989年聯合國通過《兒童權利公約》，雖然我國並非聯合國之成員國，但基於對兒少權益之重視，亦於2014年立法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顯現我國在維護兒少權益領域與國際接軌的決心。2019年修訂少事法，在虞犯少年部分有重大的變革。在用語方面，從虞犯少年改為曝險少年，從內容來看，將原本七項虞犯事由縮減至三項（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從執行面來說，將轉變為行政輔導先行，於修法四年後，曝險少年將先由少

年輔導委員會進行適當之輔導。

從虞犯少年至曝險少年的轉變，期間還經歷了2009年釋字664號大法官釋憲案，認定對於逃學逃家的少年，不得為剝奪人身自由之處分，即無法再予以收容及裁處感化教育，加上近年來對於虞犯少年議題的討論，顯示對於有觸法之虞的少年的處理方式，受到多方討論與關注。本文即討論虞犯少年處遇思維的起源，探索由司法介入的脈絡，進而對未來曝險少年處遇之展望。

貳、虞犯少年思維的起源

美國在19世紀後期，少年法院運動盛行。基於國家親權主義，將少年的犯罪行為歸為法院管轄，期能藉以維護少年健全成長。在美國法律實務中，某些行為成人為之，不構成觸法，但少年為之則為觸法，稱為身分違犯（*status offense*），身分違犯有分為兩種情形：一是非犯罪之不適當行為，指逃學、逃家、抽菸、喝酒、違反宵禁等行為。二是不適當之身分行為，指少年不受管教、任性之狀況（黃義成，2013）。從美國身分違犯的界定，可以看出身分違犯與我國的少年虞犯有相似之處，尤其是其中的非犯罪之不適當行為。

日本少年法的理念，係基於少年處於人格尚未發展成熟階段，具高度可塑性，處理少年犯罪問題應以保護及教育為主的

理念，刑事懲罰僅作為補充手段，因而嚴格限制少年進入刑事程序。日本的少年法管轄的少年年齡為14歲以上、未滿20歲之人，其少年法規範的對象分為三類，分別是：犯罪少年、觸法少年及虞犯少年。其中，虞犯少年若未滿14歲，應先由兒童相談所或福祉事務所介入，若14歲以上、未滿18歲，司法警察可選擇移送家事裁判所或兒童相談所，若為18歲以上、未滿20歲，則移送家事裁判所（林雅鋒、嚴祖照，2020）。我們的少年法的法制面與執行面，頗受日本少年法的影響。

我國1958年因少年犯罪案件增加，認為有制定少事法的必要，行政院爰提出少年法草案，後於1962年立法通過。當時少事法是以管訓代替刑罰，至於虞犯少年是否歸屬於少事法，有諸多討論。少年法初稿及立法總說明強調以教代罰，然而考量當時少年問題嚴重，為解決不良少年的問題，仍將虞犯納入。可見當時討論應是將少年法之立法作為一種社會防衛之策略，而擴大了法律的管轄範圍（周儋嫻、陳吳南，2009），期能藉由少年司法介入，防堵少年問題擴大。

從我國兒少相關立法歷程來看，1962年通過少事法、1973通過《兒童福利法》、1989通過《少年福利法》，於2003將《兒童福利法》及《少年福利法》合併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2013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修改為《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稱兒權法），2015年《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修改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就整個兒少立法歷程可以了解，少事法早於其他兒少相關法律，便將虞犯少年由少事法處理，而非從社會福利脈絡思考虞犯問題，實不難理解。

參、少年虞犯的法理

關於少年虞犯的法理論述中，黃義成（2013）指出國內外有關少年虞犯的思考脈絡，包括國家親權原則、父母權威及社會防衛思想。其間，國家親權原則充分展現於美國少年法院成立之法理，基於此原則，國家基於代理父母的地位，以矯正少年不良行為，法官代表國家，對待此等少年如同子女一般。法院介入少年的法理基礎，是認為犯罪少年或虞犯少年，係來自不良家庭，須由國家介入，導引少年向善，期能達到健全之發展。其次，父母對少年的權威在美國虞犯成立之法理，亦占有重要地位。在美國，父母有權將不受管教之少年送往機構處理。足見父母的權威在美國虞犯法治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國對於虞犯少年的處遇上，相對來說，較少有父母的權威的思維。再次，社會防衛思想則可見於我國少事法的制定。我國少事法制定之初，考量當時少年問題日益嚴重，將虞犯列入少事法規範範圍，並非基於國

家親權原則，也不是基於父母之權威，而是為防衛社會免於犯罪破壞。規範虞犯之思維，主要在預防虞犯少年進一步成為觸法少年，防患未然。

綜觀虞犯法理思維面向，都具有父權思想，相信公權力介入，可以調整少年的偏差行為，在國家親權原則及父母之權威，少年為國家處理的主體，主要著重在如何讓少年健全身心發展，在社會防衛思想，則規範少年行為，主要目的在社會防禦，少年成為維護社會安全的客體。

肆、目前虞犯少年處遇的論述脈絡

關於虞犯少年處遇有不同面向的論述，周憐嫻、陳吳南（2009）在探討虞犯的文獻中，整理虞犯處遇之論述脈絡，並區分為司法處遇說、社會福利處遇說、個人責任說及綜合說來說明虞犯少年的處遇方式：

一、司法處遇說：司法處遇說包含「國親思想」（*parens patriae*）及「社會防衛思想」，前者的意義在於以國家取代雙親或其教育上的代理人——教師地位，進而從事教養兒童、少年的工作，後者則是基於擔心虞犯少年可能演變成觸法少年，而使虞犯少年進入司法程序。因此可以看出司法處遇說是由國家介入虞犯的處分。

- 二、社會福利處遇說：主張以社會福利處遇虞犯少年者，係認為國家有義務對於處於不利情境的少年，提供相關之福利服務，以此觀點，該處理的應該是促使少年產生問題的原因。許多問題少年來自失能、失依的家庭，要處理問題少年，宜從其成長環境著手。因此主張社會福利處遇說者，認為以司法處罰少年，無助於少年偏差行為的改善，應經由社會福利整合社會資源協助少年即家庭，才是治本之道。
- 三、個人責任說：採個人責任說者認為，司法或社會福利介入虞犯處遇，似乎都暗示了少年虞犯是國家的責任，而忽略少年個人或家庭的責任。在主張個人主義的現今社會，每個人應該為自己的行為承擔風險與責任，包括養育與教養未成年子女之責。在這樣的邏輯下，當未成年人發生虞犯行為時，家庭應是第一個應當介入干預或處遇之機構。
- 四、綜合說：個人在面對複雜的社會環境時，可能面臨許多狀況是「不能」而非「不為」，無法單從個人責任或國家責任來一分为二，因而有綜合說的論述。學者李茂生曾提出「同心圓」架構來處理少年事件，可代表這種思維。他的構想是以少年為核心，外層設立了兩層防護圈，第一層之擔當者為親權者及教育者，第二層則為司法

以及行政機關，在第一層被破壞時，第二層才取代第一層責任者之地位。筆者認為，目前在實務上，對於高風險、兒少保等設有通報系統，各地設立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即具有同心圓的概念，體現了綜合說的精神。

整體而言，對於虞犯處遇的方式，除個人責任說之外，另外三項都提及國家介入之情形，實際上，關於增進兒少健全成長，國家責無旁貸，重點在於如何分工、如何介入及何時介入，始能維護兒少最佳利益。

伍、我國對少年虞犯思維的轉變

我國少事法秉持少年宜教不宜罰之思維，對於少年虞犯的處遇，已逐漸從社會防衛思想，轉而以少年為主體。近年來比較受到矚目的包括釋字664號、2014年兒童權利約及2019年少事法中將虞犯少年更名為曝險少年並改以行政輔導先行，今對此轉變，分述如次：

一、2009年釋字664號的效應

2008年高雄少年法院何明晃法官基於多年實務經驗，認為現行少事法中有關虞犯之相關規定，侵害憲法所明定之受教權，並與法律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相違，致抵觸憲法而提出釋憲之聲請。司法院大法官於2009年7月31日作成

釋字664號解釋，明確宣示少事法中有關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規定，係為維護虞犯少年健全自我成長所設之保護制度，尚難逕認係違憲；但依少事法將經常逃學逃家之虞犯少年裁定收容與令入感化教育之規定，因不符憲法之比例原則，亦與國家應採取必要保護措施保障少年人格權，使其身心健康發展之意旨有違，應於公布後一個月失效（何明晃，2009）。

從何法官聲請釋憲內容看來，係認為虞犯事件應不屬於少事法管轄，虞犯少年在進入司法體系之前，應先由教育、社會福利、民間、警政等先行介入，少年會產生虞犯行為，多肇因於家庭、學校，如此宜先從強化家庭功能、學校教育功能，必要時輔以社政單位提供合適之安置機構。然而大法官釋字664號解釋，並不認為少事法虞犯規定違憲，而是針對當時少事法虞犯事件七項中的經常逃學或逃家之少年，從憲法的觀點，指出限制其人身自由，不符憲法的23條之比例原則，亦與憲法第22條保障少年人格權之意旨有違。如此一來，虞犯少年中經常逃學逃家者，仍可依少事法的程序進行調查、審理及提供保護處分，卻不能如其他觸法或虞犯類別，進行收容或感化教育之處分。至此，對於經常逃學或逃家之少年，法院無法施以機構處遇，對於逃學逃家的少年，如有安置之需求，該如何顧及他們的需求及福祉！

二、2014年《兒童權利公約》的影響

繼2009年制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及2011年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2014年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後，我國兒少保護法律出現嶄新的面貌。施行法不但賦予兒少保護國際法上的法源，更使《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成為國內相關兒少保護規範之上位法律。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目前為我國主要的兒少保護法律，其內涵包括實體面及程序面，另少事法則屬於程序法，處理觸犯刑事法律之程序，其立法精神在於使少年犯罪後能重返社會，而非懲罰（高玉泉，2019）。

從法理而言，《兒童權利公約》為我國兒少相關法律之上位法律，其他關於兒少之相關法律不得與之牴觸，然而在《兒童權利公約》第40條提出「任何兒童，當其作為或不作為未經本國或國際法規所禁止時，不得被指稱、指控或認為涉嫌觸犯刑事法律」，依此論述，我國所指述之虞犯少年，其行為尚無達到觸法之情形，卻需依少事法移送少年法庭，與觸法少年接受同樣的調查、審理程序，因而少事法對虞犯少年之規定，實有違反《兒童權利公約》之情形。

三、2019年少事法修法——從虞犯少年到曝險少年

2019年6月19日少事法三讀通過，將原第3條虞犯之名稱改以曝險少年取代，並採行所謂行政先行措施取代司法處遇。至此，我國行之有年的少事法中虞犯之規定，正式走入歷史。這也象徵我國恪守《兒童權利公約》之決心（高玉泉，2019）。

本次少事法修法應是繼1997年修法之後，最大的一次變革，並翻轉少事法50多年來，對於虞犯少年的看法及處遇方式，主要在於翻轉虞犯印記，即對於有觸法之虞的少年，不再以虞犯稱之，而將之視為是曝險少年，認為他們可能暴露於危險中，是需要被協助的一群；其次，縮減司法介入事由，從原本的七類，減為三類，即僅餘「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法之行為」。最後，另一重大轉變是建置曝險少年行政輔導先行機制，對於曝險少年於修法四年後，即112年7月1日起施行。四年後，曝險少年將由縣市政府所屬跨局處的少年輔導委員會，先行結合相關資源，對少年施以適當期間之輔導，如評估有必要，亦可請求少年法院處理，若行政輔導有效，即毋庸再以司法介入，此即落實「行政輔導先行，以司法為後盾」之精神（註1）。

陸、未來展望

自1962年少事法立法以來，將尚無觸犯法律之少年納入，與觸法少年接受同樣的審理程序，這樣的作法，長期以來，已深植人心。然而隨著社會思維的轉變，對於兒少權益的看重，對於兒少的處遇，也需有所調整。隨著運作超過50年的少事法對虞犯少年思維的轉變，2019年少事法修法後，在少年輔導委員會（以下稱少輔會）、社會福利系統及司法系統等，都須加以調整，以因應修法後之需求。

一、強化少輔會的功能

2019少事法修法，第18條修訂增列司法警察官、檢察官或法院於執行職務時、對於少年有監督權人、少年之肄業學校、從事少年保護事業之機關或機構知有或發現知悉少年有第3條第一項第二款（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情形者，得通知少年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少年輔導委員會處理之。甚至有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之少年，亦得請求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少年輔導委員會協助之。並相對規定少年輔導委員會知悉少年有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之一者，應結合福利、教育、心理、醫療、衛生、戶政、警政、財政、金融管理、勞政、移民及其他相關資源，對少年施以適當期間之輔導。進而規定「少年輔導委員會之設

置、輔導方式、辦理事務、評估及請求少年法院處理等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強化少輔會的法定定位，確立少輔會的行政先行、輔導先行的曝險少年處遇程序。

然縣市少輔會做為曝險少年行政先行、輔導先行的主要執行機制，長期以來不免受困主責層級偏低、經費編列不足、缺乏專責人力的窘境。其間各縣市更因資源相差懸殊，工作模式不一（陳瑞基等，2020），而未能充份展現先期輔導，防患犯罪的功能。未來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在少年輔導委員會設置及相關辦法的訂定，尤需先期評估各縣市少輔會的績效及人力需求，補足專業人力，並加強與相關單位的橫向聯繫，以期強化少輔會的先期輔導，防患犯罪的功能。

二、加強兒少保及脆弱家庭處遇

對於曝險少年，尤其是逃學逃家的少年，他們的成長環境是需要被關心的，包括家庭、學校及其社區。對於影響他們的因素，家庭環境占了很大的比重，因而如果能從社會福利體系著手，加強兒少保護，提供家庭及孩子必要之協助，尤其對身處脆弱家庭兒少，提供定時之關懷。

三、針對曝險少年落實輔導先行的修法理念

2019年修法，對於虞犯（曝險）少年

係縮減其項目，從七項所減至三項，並於四年後，即2023年7月1日起，將曝險少年先由少輔會，結合福利、教育、心理、醫療、衛生、戶政等資源，對少年施以適當期間之輔導。

實際上，在兒權法第53條中明文規定「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警察、司法人員等等，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有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同法第56條更進一步規定，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等等情事，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同法第六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主司衛生、醫療和社會福利，可知兒權法對於「誘使兒少成為虞犯」的通報及其曝險少年的保護、安置，已有社政行政先行之規定。

然而長期以來，在法制面，依少事法虞犯少年移送少年法庭，進入司法處遇，雖多方考量，可經由社政處遇。然而縣市政政主管機關現行做法通常將虞犯少年定位為「司法少年」而不願碰觸，司法機關亦擔憂虞犯少年若無人處理，未能及時矯治其性格及調整環境，對虞犯少年有不良

之影響，就在此「行政機關不願接手，司法機關不敢放手」之尷尬情況下，虞犯問題難解（李正紀，2018）。造成此尷尬局面，在於兒權法和舊有少事法對於曝險兒少都有保護、安置的規範。

本次少事法修法，進一步強化少輔會的法制定位和職能，統籌對有第3條第一項第二款（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情事少年的輔導先行權責。目前縣市社政主管機關接獲兒權法接獲兒權法第53條規定之通報後，依少年是否在學身分進行不同的處遇，學生身分者由學校春暉方案進行處理，非在學者進行預防性服務方案，再由相關單位定期進行評估是否移送法院（陳淑蘭，2019）的現行做法，亦將需修正。未來，縣市社政主管機關接獲兒權法接獲兒權法第53條規定之通報後，仍應依少事法第18條之規定，通知少輔會，而由少輔會施以適當期間之輔導。少輔會如經評估認由少年法院處理，始能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者，方得敘明理由並檢具輔導相關紀錄及有關資料，請求少年法院處理之，並持續予少年輔導。

相較於過去少事法的規範不足，對有第3條第一項第二款（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情事少年的司法/社政處遇進退維谷，當前修法可謂突破困境，朝向「輔導先行、防患犯罪」，向前邁進一大步。

兒少的福祉是我們共同應該關注的議題，多數的兒童及少年，有家庭、學校關心他們，對於曝險少年，他們在外顯行為上，讓外界擔心，我們需要做的是從其外顯行為，了解其形成問題原因，進而協助他們回到應有穩定生活上。期許藉由本次少事法修法，從虞犯少年到曝險少年的轉變，讓教育、社會福利、司法共同合作，在不同的位置上，協助曝險少年更好的發展。

（本文作者：陳淑貞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博士生、臺中地方法院少年調查官；林清文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關鍵詞：少事法、虞犯少年、曝險少年、國家親權原則、社會防衛思想

註 釋

註1：司法院（2019）。〈立法院三讀通過少年事件處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新聞稿〉，檢索自<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Jirs.judicial.gov.tw/GNNWS/NNWSS002.asp?id=466989>。2019/6/4作者讀取。

參考文獻

- 何明晃（2009）。〈從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664號解釋談少年事件處理法中虞犯之規範、處遇與展望〉，「兩岸四地偏差行為少年處遇之理論與實務研討會」會議論文。臺北：臺灣大學。
- 李正紀（2018）。〈兒童權利公約在我國少年司法之實踐〉，《社區發展季刊》，162，62-71。
- 周憐嫻、陳吳南（2009）。〈「虞犯」：真的道德恐慌，假的風險治理〉，《社區發展季刊》，128，60-72。
- 林雅鋒、嚴祖照（2020）。《少年司法的理論與實務——從國際公約人權規範的角度出發》。臺北：新學林。
- 高玉泉（2019）。〈我國兒少保護法律體系之建構與評析〉，《月旦法學雜誌》，295，48-55。
- 陳淑蘭（2019）。〈少年施用第三、第四級毒品社工處遇策略之反思〉，《社區發展季刊》，167，167-215。
- 陳瑞基、張睿瑜、王則富（2020）。〈少年輔導委員會運作現況與展望〉，《社區發展季刊》，172，394-403。
- 黃義成（2013）。〈少年虞犯法理之省思與建構〉，《台大法學論叢》，42（3），631-714。